

论“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优越性和合理性

葛倩倩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在儿童文学研究面临本质主义的批判和激进后现代主义的种种问题之时,朱自强先生吸收借鉴了美国后现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提出了“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出现为儿童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路,其优越性和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有助于解决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其二,建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其三,坚守凝视、谛视、审视的三重目光。

关键词:儿童文学;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朱自强;刘绪源;时代精神;儿童本位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4-0011-04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4.003

On the Superiority and Rationality about the Essentialism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on Constructivism

GE Qianqi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China 266100)

Abstract: When the stud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confronted with the criticism of essentialism and the problems of radical postmodernism, Mr. Zhu Ziqiang absorbed the view of "truth" in the new pragmatism from an American postmodern philosopher, Richard Rorty, and put forward the essentialism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on constructivism. The essentialism starts the research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ts superiority and rationality are foun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uch as helping the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constructing the view of children's orientation and persisting the combination of inspection, examination and survey.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constructivism; postmodernism; Zhu Ziqiang; Liu Xuyuan; the spirit of the time; children's orientation

20 世纪后半期,后现代主义理论出现,对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儿童文学领域则出现了反本质论,特别是反本质主义的思潮,本质主义的旧传统遭到了批判,儿童文学研究遇到了瓶颈,近年来朱自强先生提出的“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科学的新方法,本文意在通过比较具体的学术实践来验证“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优越性和合理性。

一、由“本质主义”到“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

近年来,本质主义作为一种僵化的非历史的思

维方式日益受到众多国内外学者的质疑,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则为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提供了一种崭新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陶东风对本质主义的阐释是比较精准得当的:“在本体论上,本质主义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绝对实在、普遍人性、本真自我等),这个本质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1]也就是说,本质主义所主张的“本质”是一种恒定的“实体”,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对象,这样的思维方式的弊病渐渐暴露出来,20 世纪后半期,后现代主义理论出现,尤其是理查德·罗蒂的“真理”观为建构主义取代本质主义提供了

收稿日期:2016-10-09

作者简介:葛倩倩(1991—),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研究。

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美国后现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提出“语言的偶然”的观念,他认为:“实在界的大部分根本无关乎我们对它的描述,人类的自我是由语汇的使用所创造出来的……语言是被创造的而非被发现到的”^{[2]16}。罗蒂提出一切对事物的描述都是一种隐喻,人类无法通过超越语言与“实在”相对照而得出“真理”,因此,所有试图认识“世界的本然状况”的描述和真理都是无意义的。罗蒂主张“真理”不是与世界相符,而是主体间的“协同性”,是一种交流、碰撞、对话、商谈和协调,即“真理不能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因为语句不能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不能存在那里”,“真理,和世界一样,存在那里——这个主意是一个旧时代的遗物”^{[2]13}。也就是说,“真理”不同于现实的物质世界,它并不是有明确范畴的具体化的“实体”,而是一种抽象的观念。

西方众多哲学家、文学家与罗蒂的“真理”观不无相似之处。流行于英美大学的著名文化研究教材《文化研究导论》有这样的观点:“取代本质主义的最好方法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典型的建构主义观点可以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话总结如下:‘女人不是生为女人的,女人是变成女人的’。”^[3]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人的本质——假如人有本质的话——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固定的、普遍的东西,而是由许多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规范和准则塑造而成的。”^[4]

连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也反对把文学研究看作研究特定的明确的实体,他认为:“任何相信文学研究是研究一种稳定的、范畴明确的实体的看法,亦即类似认为昆虫学是研究昆虫的看法,都可以作为一种幻想被抛弃”^[5]。

朱自强先生对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进行了深度研究和严谨思考后,提出“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他主张“本质是一个假设的、可能的观念,需要由文本和读者来共同建构。在建构本质的过程中,……是在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文化制约中,研究者与文本进行‘对话’、碰撞、交流,共同建构某种本质(比如儿童文学)的关系”^{[6]354}。也就是说,“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认为“儿童文学”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观念,只有将“儿童文学”作为一个观念去理解,才能回答和解决儿童文学基础理

论建设和学科建设上的诸多重大问题。

二、解决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

中国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还是“现代”文学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关键问题,事关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王泉根先生和方卫平先生认为儿童文学自古存在,王泉根先生直接提出了“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古代的口头儿童文学”的概念,方卫平先生把《小儿语》作为“儿歌童谣”的例证,吴其南先生更是主张一部作品“是不是儿童文学,主要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很明显,他们把儿童文学当做一个“实体”来对待,是一种本质主义思维,这样的思维方式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难以解决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问题。

与以上学者持不同观点的是朱自强先生,朱自强先生主张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古代是没有儿童文学的,而这一观点的提出得益于其对“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坚持。

朱自强先生吸取借鉴了理查德·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在此基础上,引入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学生产场”这一观点,并参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摆脱了旧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限制,提出了作为观念和概念的“儿童文学”,另辟蹊径地来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起源问题。

朱自强先生秉持着“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通过探讨儿童文学的“一整套社会机制”,对“儿童”与“儿童文学”的概念进行了知识考古和详细辨析,发现“儿童与儿童文学都是历史的概念。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儿童却并不能作为‘儿童’而存在。在人类的历史上,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在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儿童文学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与一般文学不同,它没有古代而只有现代”^[7],“中国的‘儿童文学’这一观念,是在从古代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代产生、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儿童文学’没有古代,只有现代”^{[6]350},继而得出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的结论,对吴其南先生、王泉根先生、方卫平先生的“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观点进行了质疑,有助于解决中国

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使得一系列学术问题得以深化发展下去。

三、建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

站在“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学术立场上有助于建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首先,朱自强先生所主张的“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与刘绪源先生所倡导的“本质论”和“建构论”融合的理论方法实际上是不谋而合的。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8](以下简称《史略》)的附录《“建构论”与“本质论”——一个事关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问题》中,刘绪源先生抨击了杜传坤先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9]中所体现出的“离开了本质论的建构论”,并且提出把本质论和建构论相融合——“只有谦虚地承认既有的‘本质’,充分尊重人性的和文学的传统,在本质论的基础上尝试新的建构,我想,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新的境界”^{[8]227}。实际上,他不自觉地运用了后现代的建构主义方法,因此,刘绪源先生所倡导的“本质论”和“建构论”融合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方法与朱自强先生所主张的“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颇有相通之处。

不仅如此,实际上,刘绪源先生的“时代精神”与周作人先生的“儿童本位”论有着相通的精神品质。刘绪源先生是这样阐释“时代精神”的:“纯文学要有先锋性——这也就是时代精神。这里的‘先锋性’,既指文学形式上的,也指文学内容上的,也就是,作品要给一个时代的文学带来新东西,要有新突破。而且这突破是通过审美的方式实现的,它不是借文学作品说思想,更不是图解一个时期的政治或政策(过去那些被称为有‘时代精神’而其实只是图解概念图解政治的创作,其审美价值恰恰是最成问题的)。”^[8]同时,在《史略》中,刘绪源先生引用了周作人先生的一些主张,如儿童文学是“为儿童的”,他认为周作人先生“希望作家本人仍拥有‘赤子之心’”即“使‘说自己的话’和‘为儿童’二者有了交集”,这是“解决这一儿童文学最复杂的理论问题的唯一方案吧”^{[8]27}。可以发现,刘绪源先生的“时代精神”内在继承了周作人先生的儿童文学观,即保持儿童心性和进行自我表现。另外刘绪源先生

还以周作人先生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作为衡量儿童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基于此,刘绪源先生肯定了凌淑华的儿童小说集《小哥儿俩》,而对叶圣陶的《稻草人》(指单篇童话)、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等提出了质疑。

刘绪源先生倡导“本质论”和“建构论”的融合以及建构儿童文学史中的“时代精神”,实际上与“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是不谋而合的。正是因为内在地持有“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刘绪源先生才得以创新性地提出“时代精神”,也就是“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从而在儿童文学观上实现了与周作人先生的对接。

四、坚守凝视、谛视、审视的三重目光

站在“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学术立场上才能具备凝视、谛视、审视这三重目光。倡导“本质论”和“建构论”融合刘绪源先生便表现出了对中国儿童文学史进行“真理”建构的努力姿态。朱自强先生曾谈到:“刘绪源关于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其思想是透彻的,其目光也是深邃的。我想这与他坚持本质论研究立场直接相关,因为本质论研究必然会具备凝视、谛视、审视这三重目光。”^[10]主张“本质论”和“建构论”融合刘绪源先生表现出了严谨深厚的文学史态度,他的《史略》“是要找出此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性的东西来……给关注某一时段文学的人们提供有益的参照”^{[8]129}。而备受推崇的文学史学术著作也大多是具有“样式与秩序”的,例如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顾彬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总能因其深刻的洞见和内在的肌理给人以启示和体悟。

相反的,反本质论者否认事物具有本质,在做研究时容易失去凝视、谛视、审视这三重目光,甚至出现学术失据的问题。吴其南先生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11](以下简称《文化阐释》)中写道:“这些批评所持的大多都是本质论的文学观,认为现实有某种客观本质,文学就是对这种本质的探知和反映;儿童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儿童文学就是这种‘天性’的反映和适应,批评于是就成了对这种反映和适应的检验和评价。这种文学观、批评观不仅不能深入地理解文学,还使批评失去其独立的存在价值。”^{[11]6}显然,吴其南先生对20世纪

的儿童文学的本质论研究进行了批判,站在了反本质论的立场上,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容易导致失去凝视、谛视、审视三重目光,可能出现一些学术失误,比如关于对周作人先生的儿童本位论与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关系这一文学史事实的研究,吴其南先生的观点便有待商榷。在《文化阐释》中有这样的叙述:“杜威的儿童本位论主要是一种教育—教学理论,在五四时的中国,经过周作人、胡适等鼓吹推演,与文化人类学、‘复演说’相融合,才变成一种儿童文学理论。”^[11]然而文中却又有这样的表述:“谁将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译为儿童本位论,谁将儿童本位论引入儿童文学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证的问题。”^[11]书中吴其南先生并没有进行考证性研究,也没有提供任何文献资料来说明周作人先生吸收借鉴“杜威的儿童文学本位论”,却认定周作人先生的儿童本位论是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中国表述,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有失学理依据的。可见,只有站在“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学术立场上才能具备凝视、谛视、审视这三重目光,如若失去这三重目光则容易出现学术失误,不仅影响具体的文学史事实,而且会影响宏观的文学史态度。

五、结语

20世纪后半期后现代主义思潮劈天盖地地涌入中国,并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旧的儿童文学本质主义理论受到强烈批判,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遇到瓶颈之际,朱自强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儿童文学理论素养和丰厚的儿童文学史知识储备,潜心研讨西方前沿性理论成果,吸收借鉴了美国后现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通

过“本质论”和“建构论”的融合,提出了“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新颖的思路和方法,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和可能。“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而言,无疑是一次质的飞跃,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珍贵的学术价值,理应成为儿童文学研究者的重要思想来源。

【参考文献】

- [1] 陶东风. 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
- [2] 理查德·罗蒂. 偶然、反讽与团结[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3] 鲍尔德温. 文化研究导论[M]. 陶东风,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42-143.
- [4] 李银河. 福柯与性[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4.
- [5] 特里·伊格尔顿.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7.
- [6] 朱自强. 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M].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 [7] 朱自强.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54.
- [8] 刘绪源.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M].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
- [9] 杜传坤.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10] 朱自强. “本质论”与“建构论”的融合——论《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的文学史研究方法[J]. 东吴学术,2014(6):139.
- [11] 吴其南. 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